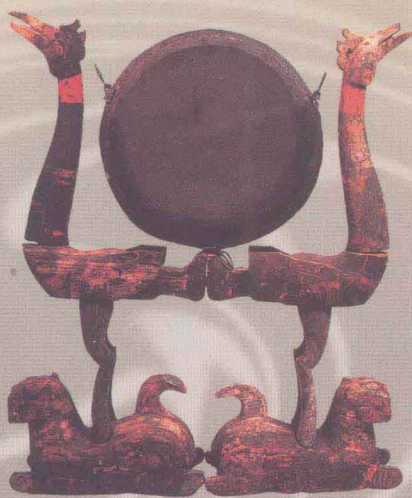


○ 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

李素娥 主编 杨顺适 副主编

荆山阴锣鼓

胡中才 李素娥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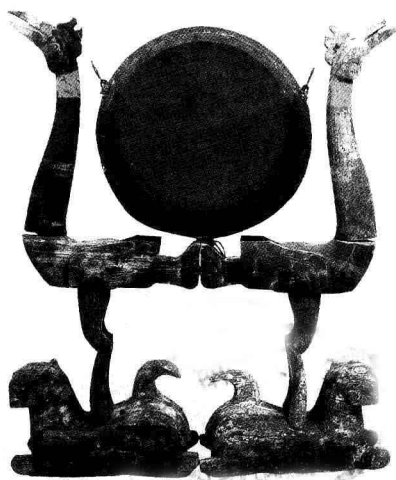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襄樊学院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基金

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

李素娥 主编 杨顺适 副主编

荆山阴锣鼓

胡中才 李素娥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山阴锣鼓/胡中才,李素娥编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6

(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ISBN 978-7-216-06217-6

I. 荆…

II. ①胡…②李…

III. 锣鼓音乐—研究—湖北省

IV. J63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093号

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荆山阴锣鼓

胡中才 李素娥 编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襄樊市鑫跃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1/16

印张: 34.5

字数: 652千字

插页: 7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6-06217-6

定价: 220.00元(共四册)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学至于行而止

——为《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而写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科人文学术事业的整体推进,我国地方高校的科研工作也出现了一片新气象。特别是对自己身边的某些有深厚历史积累、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不仅有了新认识、新观察、新理解,而且,订立计划、深入实地、收集资料、潜心研究,完成了诸多新成果。从而为学术界重新解释音乐的“地方性知识”(也译作“当地知识”)、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等,尽了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

湖北襄樊学院音乐学院《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成立五年来,先后32次深入到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保康、南漳、谷城等县境内进行田野考察,累计行程5700公里,并获得大量珍贵的访谈、观察、录音、录像、乐谱、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2010年春完成“研究计划”的前一半成果,写出《荆山扛神》、《荆山巫音》、《荆山阳锣鼓》、《荆山阴锣鼓》等四部专著。本人反复阅读了他们的“计划书”及诸书章节目录、再与课题组核心成员李素娥教授几次电话交流后,深为感动,喟然良久。仅仅凭课题组三位主要成员平均年龄已达六十四岁这一点,已让我充满崇敬之情,而此行此为中所蕴含的学术理想和人文精神更有可圈可点之处。以我粗疏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有五千年以上的演进积累,其蕴藏之深,举世公认。然而,如此厚重的文化,绝未存留于一个狭小的地理空间,反而是在东西南北辽阔无比、高低交错山重水复的地域范围之内成长起来的。于是,在多种自然条件 and 经济、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一个既有历史传统的共性又有地区、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中国”便应运而生,亦即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之大格局。从人文学术的角度而言,我们当然更看重其中的“多元”或“多样性”。因为有了多样性,生活在不同民族、地区的今人才有幸守护本地本族先民们创造的某个仅有一村、一镇、

一县、一区才存传的独特的艺术文化品种。以襄樊学院所处地域而言,众所周知,这里是古代荆楚文化的源地,而荆楚文化又是与中原商周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并可与之比肩而立的南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哲学方面如老庄,文学方面如“楚辞”,音乐方面如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等,皆可作证。而更值得珍视的是直到当代还存活的那些如本课题成员所采录的“扛神”、“巫音”、“阳锣鼓”、“阴锣鼓”、“山歌”、“打调”“高跷花鼓”、“火居道”等,以人类学者的眼光看,它们应属于最富活力的“地方性知识”范围。由于它们的口传特征,其鲜活性、本真性、独特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低视。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亟须凸显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更是弥足珍贵。

《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正是在上述时空条件下作出选题抉择的。他们不求大贪多,更不崇尚浮泛,而是把眼光首先放在本乡本土,从自己脚下这方土地上所存留的传统文化迈步,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之旅。如此选择,自然有方便、熟悉、天时、地利的种种考虑,但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心底的学术追求——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研究自己、自己解释自己,以小域而观大界、见微而知著。古训有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说的是“自知”之“贵”,“自知”之“难”。做人如此,做学术也一样。如果说,研究“在地文化”也是一种“自知”之举的话,那么,课题组以如此之“贵”、如此之“难”的事业为己任,已经做了五年,仍不辞辛苦,还要再做五年,才自觉有资格成为当地音乐的“明白人”。这样的取向和壮心,值得任何文化人向他们致敬!再多说一句,如果每个地方院校都以身边的传统文化为对象,像本课题组成员那样深入考察研究五年、十年,那么我们对于中华文化中有关音乐的“地方性知识”的认识、理解、解释,一定会大为改观。

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音乐界多次开展了传统音乐的采集、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从历次考察所涉及的范围、层面来看,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历史段落。1950—1960年代的采集考察,虽然地域范围很广,但选择的考察对象多数属于具有全国影响的一些品种,而且,限于当时学术队伍的规模,只能采取“取样”方式,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早期所进行的山西河曲“山曲”、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冀中“笙管乐”、“西安鼓乐”、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苗族民歌、芦笙音乐、苏南“十番鼓”等,上海音乐学院所进行的“青浦田歌”,陕西音乐工作者对陕北、陕南民歌的采集调查,沈阳音乐学院对东北二人转的采集考察等,

正是由于获取了这些具有代表性民间音乐品种的实地考察资料,数十位各院校教授民族音乐课程的老师和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者才齐心协力,于1964年完成了总结我国民族音乐构成体系的第一部教材和专著——《民族音乐概论》。四十多年来,“概论”在中国音乐知识的传授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于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和教学而言,具有某种奠基意义。但同时,鉴于它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起步时期的著述,故它只能在整体性、全面性方面建构了一个“本体框架”并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基本回答了那个时代音乐学界的学术诉求。就对象及其成果而言,我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概论时代”。

第二个段落是1980年—新世纪这二十余年。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展开的。虽然其规模是全国性的,但它基本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不同品种的“省卷”的编撰。对之,我们可以视为传统音乐采集、整理工作“区域层位”的一次“下移”。“集成”提出的“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九字方针,实际上是针对每一个省、市、自治区而言的。因此,通过“集成”的编撰和出版,我们对每一个省区的传统音乐类别及其蕴藏也即传统音乐的“省情”基本廓清。而与此同时,由于“集成”的实践和一大批硕、博士生学位论文以民间乐种为题,我们的音乐学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很多学者以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乐种(即包括民歌、歌舞、戏曲、说唱、器乐等类别的品种)为对象,进行了专题采集和研究,完成了为数甚多的属于“乐种学”研究的新成果。所以,从总体看,这一阶段应该是一个“集成编撰”和“乐种学研究”时代。它使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在省区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更有历史深度的新阶段。

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受到篇幅的限制,“集成”的“九字方针”,仍然是相对的。在编纂过程中,它只能选入那些最能代表本省区的有关类别和曲目。以民歌为例,“入选”与“删节”的比例,大约在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一之间。舍去者,不排除“质量”原因,但也有不少是因为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无资格“入卷”的。类似本课题中的“扛神”、“巫音”、“阴锣鼓”,肯定是被排除的。这显然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不无巧合的是,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悄然开展。数年间,随着“世界遗产”、国家级遗产、省级遗产以至市县级(地区、

县)遗产的分层认定,我们发现,对传统音乐新一轮的普查、立项、研究,使大家的关注点又一次发生了“区域层位”的下移,即从省、区“移”到市、县地区了。而且,由于“非遗”的项目不单纯是音乐类,同时有民间文学、民俗、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工艺、民间美术、中医药、餐饮等多种文化事象,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地方性知识”。更有甚者,这一次不仅仅限于学术圈子,而是有“政府主导”、有国家政策。如此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往几十年都未有过的,它表明,包括音乐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将获得一个更加宽松、宽容的环境。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又进入“非遗”保护时代。所以,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特色是,以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各类传统文化遗产(当然包括音乐)为对象,以特定类别的流传区域为单位,用“实地考察”和“文化阐释”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完整的描述与研究,以期对区域性传统音乐事象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

我认为,《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就是一种“躬逢其盛”的作为。他们在过去“集成”编纂的基础上,选择当地最富有根性的民间音乐品种,有计划地进行再收集、再考察,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文化解释,这正好体现了传统音乐研究的某种新趋向。

三、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虽然一直在强调改革,但给我自己的印象,似乎收效不很大。以课程设置和知识传授而言,一半是西方,另一半是中国自己的。而这一半当中,古代史、近现当代的专业音乐,以及技艺训练等内容又居于主要地位。真正涉及到传统音乐的内容,无论是专业音乐院校,还是综合大学的音乐专业,比重较少。为此,我近期常常会发出“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离传统究竟有多远”、“传统在哪里”的疑问。公正地说,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自己面对专业音乐教育的现实所产生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特别是地方院校,偶然问到学生有关本地区的民间音乐品种以及他是否有过看地方戏、听当地民歌、说唱音乐及有无参与民俗仪式音乐活动的经历时,多半以“摇头”作答。可见,学校所在地的传统音乐基本上在他读书的几年中,无论课堂还是艺术实践,都无缘“谋面”。这样的现象应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学音乐的中国学生,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如此生疏、如此隔膜;一个设立在有悠久历史传统城市的大学,对当地民间音乐长期陌如路人,不闻不问,我觉得都是不正常的。固然,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也不能怪罪哪位学生或哪位老师。但这确实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顽症”之一,我们只有下决

心从深层寻找根由,群起而“改”,才是克服之道。

可喜者,《荆山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们似乎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但在对策上,他们既没有抱怨,也没有虚张,而是以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向学校申请立项,并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被列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襄樊学院鄂北区域文化发展中心的重点资助项目;一方面请曾经参与历次音乐文化采集考察、十分熟悉本地传统音乐蕴藏的同行加盟,共襄盛举。荀子在《儒效篇》有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面对荆山丰富多样的传统音乐,课题组正是以这种闻、见、知、行的认识论精神,通过“田野”走进传统;通过田野,感受本地区“原生”音乐的生命力和文化个性;通过田野,砺练自己。最终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前四部论著,也完成了自己学术的“成人礼仪”。除了感动,我还要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我也坚信,他们将走下去,用自己的智慧、辛劳,把古老的荆楚文化最精彩的底蕴,彰显给世人!并使之成为一笔取之不竭的资源,在襄樊学院的音乐教学科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乔建中

2010年7月5日

草于京北思仁斋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内 容 摘 要

荆山阴锣鼓就是荆山一带的“闹丧锣鼓”。也有的叫“夜锣鼓”、“唱丧歌”、“唱夜歌”、“唱孝歌”等,用于治丧,夜间进行,是孝子为所逝世的长辈举行的隆重葬礼。人亡之后,所有亲朋好友及全村人前来陪亡人,民间艺人绕着灵柩鸣锣击鼓唱孝歌,劝孝劝善,通宵达旦,锣鼓声、歌声不绝。其形式有转丧、跳丧、坐丧、送丧等。本著以详实的论据论证了荆山阴锣鼓是古人祭祖习俗的发展,是楚孝文化和苗歌蛮舞融合,无论从程序上、唱法上、跳法上,楚时已相当完善,自汉唐至明清的传播中,在荆山一带都将楚时的风格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全书共分七章,即阴锣鼓的历史源流、社会功能、主要程序、曲牌和锣鼓乐、艺术特色、传承特征和展望、歌词选注。共有 47 万字。对其 14 个程序如何操作都作了具体说明;对各类唱段作了记谱;对其所选 1014 首歌词中的典故和方言也都作了注释。其形式、唱法、歌词都保留了原生态特征,是一套避免无形文化遗产失传的教材式著作。同时,它也可作为“地方性知识”运用到高校音乐专业现有的“中国民族音乐概论”课程中予以补充,并赋予实际意义上的有效传承。

有研究者认为,鄂西土家族的跳丧为“武丧”,荆山一带闹丧为“文丧”。作者对两地丧事从历史渊源到现实状况,都进行了考察,并详叙了两者区别。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阴锣鼓的历史源流	(2)
第一节 古人祭祖习俗的发展	(2)
第二节 楚孝文化和苗歌蛮舞融合	(3)
第三节 楚完善了阴锣鼓	(5)
第四节 汉唐至明清的传播	(14)
第二章 阴锣鼓的社会功能	(17)
第一节 宣传教育功能	(17)
一、劝人行孝	(17)
二、劝人行善	(18)
三、劝人修性	(18)
四、劝人报恩	(19)
五、劝人和睦	(20)
第二节 和谐邻里的功能	(20)
一、不请自来	(20)
二、反客为主	(21)
三、物尽其用	(21)
四、丧鼓赶情	(21)
第三节 传承文化的功能	(22)
第四节 娱乐审美功能	(24)
第三章 阴锣鼓的主要程序	(34)
第一节 前半夜的程序	(34)
一、绕棺	(34)
二、牌子(闹台)	(35)
三、开歌路	(35)
四、唱散歌(含转鼓后、小还阳后的穿插)	(38)

五、转鼓	(50)
六、小还阳	(58)
第二节 后半夜的程序	(69)
一、拦棺酒	(69)
二、送亡过关	(74)
三、奉孝	(85)
四、唱古(或唱对子歌)	(86)
五、还阳	(90)
六、封棺明路	(95)
七、出丧	(105)
八、下葬	(106)
九、安家神	(108)
第四章 阴锣鼓的传承特征	(113)
第一节 阴锣鼓的传承特征	(113)
一、拜师收徒、家族传承和临场瞞学结合	(113)
二、锣鼓搭班和响手班子并用	(114)
三、打击乐谱以口诀段子衔接穿插	(115)
四、转丧、跳丧、坐丧、送丧并用	(119)
五、娱神与娱人功能并存	(120)
六、楚巫主张与佛道思想并存	(121)
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存	(121)
八、因人而异,择歌而讴	(122)
九、艺规艺德重于艺技	(123)
第二节 阴锣鼓与土家族跳丧之异同	(124)
第三节 对阴锣鼓前途的展望	(126)
第五章 阴锣鼓的音乐特色	(129)
一、乐曲徵、宫调式并存,徵调式占绝对优势	(129)
二、曲体结构长大,采用曲牌联缀	(130)
三、结构以四小节一句为基础,运用衬词衬句使旋律得到扩充	(131)
四、旋律的发展变化,是受歌词结构的影响	(132)
五、节拍快速三拍子的运用,与转鼓步伐的巧妙结合	(132)
六、结尾叠音的运用,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33)
七、唱奏相联、领合一体、白诵兼融	(134)

八、唱词的俚语性	(134)
第六章 阴锣鼓的曲牌和锣鼓乐	(136)
牌子	(136)
散歌	(139)
转鼓	(159)
谢棺酒	(167)
奠酒	(176)
送亡	(189)
还阳	(195)
第七章 阴锣鼓歌词选注	(200)
第一节 散歌	(200)
开场歌	(200)
进门歌(一)	(200)
进门歌(二)	(203)
进门歌(三)	(205)
进门歌(四)	(208)
梭楞树	(208)
开路歌	(209)
招魂歌(一)	(210)
招魂歌(二)	(210)
不觉走来不觉行	(212)
哭丧	(214)
迎孝歌	(218)
亡魂度更	(220)
孝歌(一)	(222)
孝歌(二)	(227)
龙星照	(229)
劝孝子	(230)
酒色财气歌	(234)
十二月孝双亲	(235)
八劝歌	(239)
舍了歌	(241)
舍不得	(242)

孔明遗囑·····	(245)
君臣悼孝·····	(247)
孔明托梦·····	(248)
三气周瑜·····	(249)
周瑜托梦·····	(261)
人生逢八·····	(265)
为人一生都有难·····	(268)
丧歌段子·····	(269)
姐梳头·····	(270)
姊妹五个说婆家·····	(272)
丧歌集锦·····	(272)
十二月讲古·····	(276)
大纲鉴·····	(279)
五湖大纲·····	(307)
五更杨家将·····	(310)
桂香挨磨到五更·····	(312)
花儿歌·····	(313)
杨广庆寿·····	(315)
纣王焚香·····	(321)
唱古散段子·····	(326)
五更李三娘挨磨·····	(332)
讲古散歌·····	(334)
对子歌·····	(337)
十二属相会师友·····	(343)
艺中情·····	(345)
金锁连·····	(349)
松柏竹柳青·····	(360)
云游五湖·····	(365)
五湖情(一)·····	(370)
五湖情(二)·····	(374)
虎口运·····	(377)
歌师情·····	(378)
三柱半香·····	(385)
都来唱·····	(386)
上一个山过一个岭·····	(387)

人生不可争高下.....	(388)
背水记.....	(391)
歌师亲.....	(398)
会歌师.....	(399)
唐王游地府.....	(401)
对子唱.....	(411)
第二节 转鼓歌.....	(420)
转鼓歌.....	(420)
三孝记.....	(422)
老鼠告状.....	(427)
孟姜过关.....	(436)
罗成显魂.....	(446)
王重阳学道.....	(462)
夫妇同学道.....	(474)
二十四孝歌.....	(482)
第三节 送亡过关.....	(487)
亡魂辞孝.....	(487)
详查亡魂史节簿.....	(490)
辞孝:月儿闪闪五更天	(492)
忠孝节义.....	(493)
亡魂尽节.....	(494)
奠 酒.....	(497)
送 亡.....	(498)
走十殿.....	(500)
奉 孝.....	(503)
第四节 还阳歌.....	(505)
还阳五道门.....	(505)
谢五门并四方.....	(507)
颂孝家.....	(508)
朱氏割肝.....	(509)
张孝打风.....	(516)
后记.....	(533)

南条荆山源于房县、神农架,横贯保康、南漳等县,尾于宜城、襄阳。这里曾是以三苗为主的南蛮中心地区,又是先楚建都之地。这里的许多民风民俗既带有南蛮特色,更带有古楚遗风。荆山阴锣鼓就是突出的代表。阴锣鼓也叫“闹丧锣鼓”、“夜锣鼓”、“唱丧歌”、“唱夜歌”、“闹丧”,用于治丧,夜间进行,是孝子为所逝世的长辈举行的隆重葬礼。人亡之后,所有亲朋好友及全村人前来陪亡人,民间艺人绕着灵柩鸣锣击鼓唱孝歌,通宵达旦,锣鼓声、歌声不绝。其主要程式有闹台、开歌路、唱散歌、转鼓、谢棺酒、奠酒、送亡、过五关、奉孝、还阳、封棺明路、穿堂、出丧、安家神等。其形式有转丧、跳丧、坐丧、送丧等。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把阴与阳相对。在时间划分上,夜为阴,日为阳;在生死划分上,死为阴,生为阳;在性别划分上,女为阴,男为阳;在方向划分上,坐南朝北为阴,坐北朝南为阳等等。阴锣鼓之为“阴”,是因其既是夜间在灵堂敲锣击鼓歌唱,内容又是祭祀亡灵,时间、内容俱为“阴”,故荆山山民称之为“阴锣鼓”。

这种闹丧锣鼓仅在鄂西北等楚地山区流行,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的局限,追其根,溯其源,是南条荆山独特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是与南条荆山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关联的。

第一章 阴锣鼓的历史源流

第一节 古人祭祖习俗的发展

研究阴锣鼓的历史源流,要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考察。阴锣鼓的内容是祭祀已故长辈的亡灵,形式是以歌乐伴亡。

祭祀亡灵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原始社会,正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①像这样的原始社会,既“无上下长幼之道”,又“无进退揖让之礼”,是不可能对亡灵进行祭祀的。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礼记·礼运》称这个时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②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③舜生活在“父顽、母嚚、象傲”的家庭环境里,仍然对父母“不失子道”,家人要害他时,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孝施爱。他的父母“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④。正是“舜年二十以孝闻”,所以,尧将位禅让给他,并以“二女妻舜”^⑤。民间流传的《混沌记》载,尧将位禅让给舜后,舜还专程回家探望父母。清《二十四孝》刻本,就把舜作为了第一行孝人,称“第一行孝是大舜,历山耕田顺亲心”。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晚辈对长辈有了敬重之情,生而敬,死而念,祭祀亡灵的社会基础才有了萌芽。

《礼记·礼运》又载,在“禹、汤、文、武”时代,社会发展到了“各亲其亲,各子其

①② 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页、第11页。

③④⑤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第5页。

子”了,国家又以“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①这样以来,以血缘关系维系的亲情关系更加密切,祭祀亡灵才开始有了社会基础。

夏、商时期,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阶层出现了祭祀奴隶主亡灵的祭祀活动。根据卜辞记载,当时奴隶主死后要用奴隶殉葬,少则一两名,多者几十人。在墓前还要杀死许多奴隶来祭祀死者。这种野蛮的祭祀亡灵的活动,为人类祭祀亡灵活动奠了基。这里要特别提到商代,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研究认为,“商人已开始崇拜祖先,统治者认为商的先公、先王可以宾于帝或是配于天,即他们升到上帝左右,获得和上帝相仿佛的某些权力,商人对先公先王的祭祀名目繁多,仪式十分隆重”^②。这就是说,自商时起,人们祭祀亡灵,已经有了一种仪式。只是各个民族的仪式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自商以后,人们对先祖的祭祀已习以为俗了。

第二节 楚孝文化和苗歌蛮舞融合

在我们的祖先中,楚人是最崇拜先祖的,特别是对已故之先祖,楚人都是当作神来祭奠的。先楚之时,楚人尊祝融和鬻熊为先祖。祝融是重黎的荣誉称号,《史记·楚世家》谓重黎是“楚之先祖”,“为帝誉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誉命曰祝融”^③。而鬻熊是祝融后人酋长,《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时,楚人鬻熊“往归之”^④,又任周之火师。楚人对这两个先祖特别尊崇,《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夔子国是半楚同姓国,因“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就要灭掉这个不孝之子孙,“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⑤。夔子仅仅因为没有祭祀先祖而遭到灭国之祸,可见楚人特别重视对先祖的祭祀。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在其《楚文化史·楚文化的渊源》中研究认为,“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⑥,所以,早期楚人对任火正、火师的先祖祝融和鬻熊,肯定是当作神来祭祀的。对如何举行祭祀仪式,虽未见明显的文字记载,自然也是有一定的祭祀仪式的。从楚人灭掉“不祀祝融与鬻熊”的夔子,也说明当时对祭祀祖先是有仪式的,楚人只能从是否举行祭祀仪式来观察夔子是否祭祀了祝融与鬻熊。没有特定

① 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出版)11—12页。

② 同上。29—30页。

③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10月出版)325页。

④ 同上。21页。

⑤ 《四书五经》(线装书局2002年1月出版)1030页。

⑥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4页。